

書 評

吳 淳 邦*

黎子鵬

《福音演義——晚清漢語基督教小說的書寫》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282頁，ISBN 9789863502449

漢語基督教小說處於宗教與文學之間，是面向普通讀者宣教，寓「教」於樂的一種具體有效的方式。但因作品宗教內涵不夠深刻，宗教學者對其興趣不大，又因作品文學造詣魚龍混雜，文學學者深入涉及不多。另一方面，關於漢語基督教小說的深入研究，對研究者也提出了宗教與文學素養的雙重要求。幸而黎子鵬就是屈指可數的一位，其著《福音演義——晚清漢語基督教小說的書寫》就是從宗教、文學兩方面均衡切入的研究成果。本書分為上下兩編（翻譯編與創作編）、首尾兩論（導論與結論），全書共有七章，採用中西相關理論來探析晚清漢語基督教小說作品。

本書第一章考察現存首部漢譯德文基督教小說《金屋型儀》。作品圍繞猶太女孩「咄喳（Thirza）」改信基督教的故事探討了兩個問題——如何處理猶太教與基督教之間的宗教矛盾，以及信仰與家庭之間的張力。針對這部

2017年12月11日收稿，2018年5月24日修訂完成，2019年1月15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韓國崇實大學中文系教授。

Oh Soon-b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ongsil University.

作品，黎子鵬從文學角度，就內容方面，作者考察出作品反映的宗教、文化、民族之間的種種衝突，這與晚清中國基督徒的處境有所相似。就體裁方面，作者指出譯者把西方小說譯成中國傳統章回體小說，力求迎合譯入語的文學規範。譯作反映出譯者葉納清（Ferdinand Genähr, 1823-1864）讀者取向的翻譯策略。作者重點分析了譯作中女性形象本土化處理的問題，指出這是迎合中國讀者閱讀審美習慣的表徵。黎子鵬對該部譯作的分析，試圖探討傳教士通過翻譯文學來表述與傳播宗教思想的策略。

第三章分析十九世紀膾炙人口的基督教兒童翻譯小說《安樂家》。此作品在晚清時期流傳甚廣，又成為中國基督教兒童主日學校的重要讀本，可謂開創了中國兒童小說的先河。鑑於此作品的意義和影響，作者較詳細地介紹了譯作的內容。小說中流浪者對「天上安樂家」的渴求，作者認為這種對他界樂園的想像正是自我取向永生救贖的積極方式。作者從視覺、聽覺、心理方面對小說中景象、音樂和夢境的文學處理進行分析，指出這種全方位別緻的文學表達方式，為的是向中國讀者呈現出一幅生動的天國樂園圖像，滿足信徒對基督教樂園的想像，從而更加虔誠地信奉上帝。

第四章探討郭實獵（Karl F. A. Gutzlaff, 1803-1851）創作的小說《是非畧論》，此作品另闢蹊徑，把「大英國」建構成「無上之國」的形象，暗示天國如何在地上實現。故事情節是透過一位「英國通」——廣東商人陳善與鄉人辯論展開的。商人與鄉人辯論的話題相當廣泛，包括英國的教育、婚姻、政治、司法制度、經濟狀況、科技發展，以及婦女地位等。此章在細讀文本及分析的基礎上，配以反映當時社會、宗教、政治、文化等方面豐富的史料考察，展示傳教士向中國人描繪英國社會的特定表述，以及探討郭實獵為何如此架構英國形象的複雜因素。黎子鵬在第四章以一節的篇幅專論晚清華人的對外觀念，包括傳統的華夷觀點，以及十九世紀以來的針對英國的排外情緒。該節陳述甚詳，與黎子鵬近年來的研究關注點有關。他2013年出版了《贖罪之道傳——郭實獵基督教小說集》的編注本，在其〈導論〉中以六十七頁的篇幅專探傳教士郭實獵基督教小說的出版背景與書寫策略，可見他對郭實獵小說的深厚研究功力。郭實獵基督教小說多清楚論述基督教與中國傳統宗教的差異，又詳細引述耶穌的生平及教導，並在教義的層面上著墨頗多。而《是非畧論》則著力描寫宗教信仰如何扎根於

英國人的每一生活層面，與其文化不可分割，因此在文中更集中描述英人的教堂、禮拜以及社會宗教習俗。郭實獵力圖把「大英國」建構成基督教感化下的「無上之國」，將其美化成基督教人間的樂園善果。而這一建構又是在文學的框架下表達，其效果有二：一來減低中國人對「西夷異端」的負面情緒，二來突出英國「持守正教」的積極意義。基督教樂園的人間實證在文學建構下呈現在中國讀者面正是《是非畧論》這部基督教小說的特色所在。

總體來看，《是非畧論》的創作，主要是為要改變十九世紀前期華人對英國或西方負面的「集體想像」，甚至不惜誇大英國的正面形象，試圖緩和晚清民眾的排外情緒。當時，中國對外的門戶尚未完全打開，英方對清廷的貿易保護政策日趨不滿，而華人對英人亦偏見日深。《是非畧論》寫出了一般華人對外國的偏見和誤解，同時又以一華人「英國通」將其親眼目睹的英國全況介紹給華人朋友，一一化解偏見和誤解，同時把英國誇張成地上的「無上之國」，試圖彰顯英國富強的宗教基礎——基督教文明。其最終目的是去掉華人眼中英國的「非」，構建英國在基督教氛圍籠罩下的「是」。作者希望華人承認基督榮光下世俗英國的偉大，感受基督教無上的能量，從而接受宣教選擇皈依。值得一提的是，本書作者考證出《是非畧論》中關於英國的描述再三引用《大英國人史略說》的相關內容，以及對其它史料的考察，顯示其在這一領域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張佃書《無名小說》中表述宗教與社會改良的關係與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徵文比賽的初衷非常接近。傅蘭雅舉行徵文比賽的目的正是希望當時的知識分子能從基督教的眼光或立場出發，來批判中國社會的時弊，以達致改革社會的功效。張佃書寫作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結束不久，中國知識分子在戰敗的恥辱中深切反省，急切尋求救國方案。這種哀祖國之不幸，怒祖國不爭的情緒影響到張佃書的徵文中。他把對主人公卞尚文個人罪惡的批判擴展到社會、國家的層面，猛力抨擊鴉片、時文、纏足等惡弊。更甚者，他認為正是由於這種流弊蔓延至軍隊，導致中國軍紀散漫，才有甲午慘敗的惡果。惡弊纏身的中國是作為該文反面形象呈現的，日本則是作為與之相對的正面形象出場的。張佃書將當時的敵國日本理想化，指出日本是因為舉國信奉基督教而革除了大煙之害，又描寫日本

女人不受纏足之苦，所以能投軍參與作戰報效國家。這些關於日本的描述固然與歷史事實相差甚遠，但可以看出張佃書意欲透過想像日本因接受基督教而富強，暗示中國也應當接受基督教，革除社會弊病，方可達到像日本般富國強民。小說中，卞尚文皈依基督教是由日本信徒指引下完成，這一情節擯棄了狹隘的民族主義，以基督教大同視角，超越了敵我的藩籬。小說作者以此情節表達了其篤信「基督大愛」，願意摒除偏見，共同追求美好道德生活的良好願望。至於張佃書如此美化日本的形象，不僅有自己本身的想像，可能也受到傳教士報刊的影響，尤其是《萬國公報》當時經常刊載對日本明治維新正面肯定的文章。黎子鵬在分析《無名小說》時，重點是從文學角度切入，抓住「時調」這個點從其源流、形式、內容及功能分析，採用解剖麻雀的方法一窺當時基督教文學是如何為晚清文學注入新元素的。這種踩點細緻深入的分析方式可以作為研究其他漢語基督教小說的借鑑。

本書研究七部小說分七個章節，均屬於著者高度原創性研究，文學書寫策略或文化背景分析入微，同時又借用文學與宗教領域的研究方法來探究相關作品。其宗教文學價值不容低估，筆者不一一針對各章節進行評述，就取其中一些章節作上文點評。總而言之，本書的最大特點在於對研究作品中體現的「以儒釋耶」，例如《勝旅景程》的「儒家評批」。在第二章中，作者首先指出《天路歷程》漢譯本《勝旅景程》彌足珍貴的研究價值。其歸化翻譯特色十分顯著，內容上，譯作中穿插了不少中國宗教與文學的典故，不時援引儒家的經典來詮釋小說中的基督教思想。形式上，很大程度上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學形式，尤為突出的是，運用了小說點評。作者針對小說點評的內容進行詳細分析來一窺基督教傳教士「耶儒會通」的詮釋策略；又如《約瑟紀畧》的「聖賢之德」也有以儒家思想來詮釋基督教的思想傾向。著者在第五章中緊扣「稗說聖經」的主題，分析倫敦會傳教士理雅各的史傳體小說《約瑟紀畧》，觀察中國小說形式與《聖經》的互動關係。《約瑟紀畧》是傳教士理雅各根據《聖經·舊約》約瑟故事改編而成。約瑟故事在《聖經》中算得上比較有戲劇性，而《約瑟紀畧》更是對其情節和人物性格進行補充渲染，使得人物更加豐滿，情節更加生動，從而起到吸引中國讀者對《聖經》產生興趣，達到傳教的編寫目的。我們

認為對《約瑟紀畧》的研究可以瞭解中國小說和《聖經》的互文影響，這算得上中國文學傳統在近代的傳承和嬗變的一個方面，同時藉此作品可以一窺儒家思想與基督教文化的交流和會通。或以佛道解耶，例如《無名小說》的「信仰圖譜諸教合流」，進行分析考證該作品的書寫策略及基督教與中國傳統宗教之間的對話交流處境。尤其是身為華人學界的宗教學者黎子鵬教授，在反思基督教本色化、宗教融合、宗教對話等重要議題時，總要自覺地結合中國宗教文化傳統來作回應，以期把這些問題融合到對自身文化之根的考察中，尋找對現實宗教問題的解答。就著這些問題的思考，相信本書的研究能為我們提供一些重要啓示。

宗教和文學之間乃是一種互動關係，此書嘗試整合宗教和文學兩個領域的資源，進行多角度的深入考察，能促進宗教學和文學的科際整合，豐富兩者的發展空間，進而探索在華人學術處境中建立「宗教與文學」的跨學科研究體系。若將本書研究對象七部作品的評論放在此座標中，「漢語基督教小說與宗教傳播」可算得上融合貫通，並在該類研究領域中找到中肯的地位。但相對來說，本書很少剖析作品的語言文章造詣與特點。其一、分析文本讚語多，貶評少，作品宗教文化語境的分析探論幾乎偏於美化。過去學界是忽視這方面作品研究的，個中有政治因素的影響，資料缺失搜集困難等因素，但是作品本身文學性的不完美也是被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過往必須矯正的溢美起到引起學界重視的作用，但恐有後勁不足之嫌疑。公允而客觀、不吝針砭的評價，點出這些作品的不足之處，把它們放到中西文學、中西宗教交流的進程中去看，這些不足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也是文學發展和文化交流演進中必不可少的一環。另外，對於其文字造詣、小說作品情節結構的發展脈絡析論少之又少，恐算是本書以後得加以補充研究之處。第二、基督教中文小說早期的譯著以西方傳教士為主導。西方傳教士來華從事寫作時，對作品的構思與內容先用口述方式告訴中文助手，其華人助手再通過筆寫並加以潤飾之後才予以刊行。早期的基督教中文小說幾乎不標記著者與譯者的姓名，例如：《張遠兩友相論》（1819）、《轉禍為福之傳》（1838）等，或有僅標明作者筆名的作品，例如：《贖罪之道傳》（愛漢者，1838）、《正邪比較》（善德，1838）等。這些作品的著作權到底屬於誰，今日則只有

通過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的著錄等，才能知道著者與譯者的姓名，以及該作品的出版書誌相關事項。然而到了十九世紀中後期，開始有作品標記著者與華人助手的姓名，例如《喻道傳》（1858）標明由美國長老會傳教士丁韋良（William A. P. Martin, 1827-1916）著、范蓉棣筆述；《引家當道》（1882）標明由英國傳教士楊格非（Griffith John, 1831-1921）著、沈子星筆述等。此兩部作品的〈序文〉都由華人助手執筆寫成，可算是西教士與華人助手共同譯著的作品。儘管傳教士俾士（George Piercy, 1829-1913）與費樂仁（Lauren Pfister）指出《約瑟紀畧》的作者是理雅各的助手何進善（參考 131 頁，腳註 4），但按照十九世紀中葉的翻譯方法，我們認為把《約瑟紀畧》說成是理雅各和何進善合作的結果更妥。本書對於譯著者的研究稍有不足，比如對時新小說作家張佃書、郭子符等人生平少有涉及，這固然有史料缺乏的客觀原因，期待今後大家努力耙梳史料能有所發現。正是這種美中不足的遺憾也對學界同仁提出一個必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對於華人基督教小說作家須待加以研究考證。另外，正如理雅各有其合作助手何進善一樣，晚清基督教小說譯著者郭實獵、葉納清、胡德邁（Thomas Hall Hudson, 1800-1876）、博美瑞（Mary Harriet Porter, 1846-1929）也有其合作出版的華人合作者，學界針對這些人的研究稍顯蒼白。這非一人之力可為，需要學界同仁共同努力。總之，本書對譯著者的研究未能對前人研究成果有更大的超越和突破，僅是增加考證的資料。當然，這樣的考證突破有相當的難度，但是黎子鵬如若像俾士與費樂仁那樣從英文資料中考證出來，憑藉自己淵博的學識和深厚的專業功力，我們相信著者一定會從歷史的故紙堆裏耙梳出更多、更加詳實、更有價值的文學史資料。《福音演義——晚清漢語基督教小說的書寫》的學術水準值得讓我們期待黎子鵬更多的佳作。